

2005-2014
太阳鸟文学年选

中篇小说

2011
中国最佳

中国文坛流金十年的永恒经典

主编◎王蒙
分卷主编◎林建法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1
中国最佳中篇小说

主 编 王 蒙
分卷主编 林建法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1 中国最佳中篇小说/林建法编.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7. 7

(太阳鸟文学年选 / 王蒙主编)

ISBN 978 - 7 - 205 - 08900 - 9

I. ①2… II. ①林…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7068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 - 23284321 (邮购) 024 - 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 024 - 23284191 (发行部) 024 - 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 三河市同力彩印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15.25

字 数: 429 千字

出版时间: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丽竹 陶 然

封面设计: 小 北

版式设计: 孙志武

责任校对: 迪 舟

书 号: ISBN 978 - 7 - 205 - 08900 - 9

定 价: 59.80 元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 蒙
执行主编 林建法
编 委 林 非 叶延滨 王得后
张东平 孙 郁

分卷主编

散 文 卷 王必胜 潘凯雄
随 笔 卷 潘凯雄 王必胜
杂 文 卷 王乾荣
诗 歌 卷 宗仁发
中篇小说卷 林建法
短篇小说卷 林建法

序：在超越的“路上”

——《2011 中国最佳中篇小说》^① 序

罗振亚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相交前后，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很多读者难以再有仔细阅读长篇小说的时间和耐心，又觉得短篇小说过于简略狭窄，遂对中篇小说产生了更多的心理期许；同时，《收获》之外纷纷创立的《十月》、《钟山》、《当代》、《花城》等多家大型文学期刊的刺激，共同使内涵相对丰富的中篇小说凭借其文体优势“异军突起”，与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形成了小说家族的鼎立三足。并且王蒙、张贤亮、冯骥才、路遥、高晓声、铁凝、阿城等作家，也纷纷以中篇小说为突破口，取得了不菲的艺术成就，以至于后来有人认为中篇小说“不仅代表了这个时代高端的文学成就，而且也是百年中国文学成就最大的文体”^②。待到 90 年代以后，在长篇小说市场包装的繁荣面前，中篇小说虽然开始风光不再，但好在不少作家置身于严峻的困境中，能够不温不火，非但没消弭意志，反倒以沉稳、坚守的姿态，在作品的文学性维度上积极探索，寻找着超越的途径，在 2011 的中篇小说创作中，我又一次感受到了这种努力突破的奇妙信息。

思考力，与精神勘探同步生长

中篇小说在新时期的复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向日常生活与人类情

^① 林建法主编：《2011 中国最佳中篇小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 年 1 月。

^② 孟繁华：《新世纪十年：中篇小说发生了什么——论作为高端艺术成就的中篇小说》，《东岳论丛》2011 年第 2 期。

感的转换，至于地域文化、国家现实和远去的历史，则日渐退居为作家们进入小说世界的外在机缘点。而新近的中篇小说文本表明：作家们依旧在多元的题材空间耕耘，关注着国计民生等现实的大小问题，和普通人的世俗存在与精神变化，对生命有着更高层次的体恤和尊重；但是已经不把它们作为最高旨归，更多的时候作家们不仅仅书写生活与情感，而是把一切书写对象作为叙述的背景和媒介，展开对历史、人生、人性等领域的精神体验和感知的思考，使小说中同精神勘探同步的知性思考力悄然生长，比重和分量也越来越大。

如池莉的《她的城》地方气息十分浓郁，汉口的街道、建筑名称，市民的饮食、脾性都一一具现，说的都是些家长里短，可是经作家的渲染却很迷人，让你非跟着她读下去不可，在不知不觉中渐次走进女性小人物的生活状态和生命哲学。人们始终在追问，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显然除了生命之外就是爱情和婚姻，有时她们甚至把爱情和婚姻看得高于生命。也正因为如此，女性在爱情和婚姻中表现得比男性更投入、更动人、更美丽，但被伤害得也最深痛、最严重、最惨烈，当然也就最值得怜惜。《她的城》里的三个女性，从老一辈的婆婆、到人近中年的蜜姐、再到少妇逢春，无一例外都和苦难的遭遇打过照面，只是谁也没有被压倒，谁也不需要眼泪和同情。作者在她们三个“小人物”身上，发现了生命的亮色和韧性之美：蜜姐的婆婆在“文革”中丈夫自杀，她也痛苦，却出奇地平静，硬是像有男人一样把儿子带大成人，知道儿媳有了外遇也从不揭短，令儿媳难堪，而是处处护着，而且在儿子死后头七的日子，劝儿媳可以走出一大步。那种善良宽厚，那种雍容大度，那种无言大爱，让人震撼。蜜姐更具有汉口女人的坚强和坚定，死了丈夫宋江涛，生意也不比以前那样大、那样排场了，但她仍旧孝顺地照顾婆婆，养护读书的儿子，在逼仄的小阁楼里开起一家擦鞋店，凭着她的勤劳、精明，使生意红红火火，每天光鲜洁净地开门见人，把自己磨练成了一个仗义泼辣、人鬼皆能对付的“人精”。而年轻的逢春呢？别人以为她一个白领丽人，嫁了英俊帅气的男子周源，经济条件又十分优裕，定是幸福无比，殊不知丈夫是个同性恋，对家庭与她不管不顾，只是她并未因此绝望，努力放下架子去鞋店为人擦

鞋，在粉碎自己一场瞬间的婚外情感后，依然笑对人生。小说在三个女性及其关系的书写中，逐渐抵达了现代人生活和生命的本质所在，花前月下只是理想和短暂的梦幻，锅碗瓢盆的烟火气才是长久的世俗人生，有自尊的坚守就值得敬爱，获得同性的理解、关怀更是需要倍加珍惜的莫大福分。单独看，作品极尽人物的个性，逢春天真温柔、善于幻想，蜜姐精明利落、豪爽大度，婆婆宽容沉静、处事得体；但并置在一处则是一个人一生三个不同阶段的生动写照，揭示出生活“内中有多大不幸与悲哀，面子上也就是这样的纹丝不动”的底蕴内涵。小说着眼于小人物的抚摸与观照，客观效果却落在了女性积极、独立、坚韧生命观的昭示上，即不论遭遇怎样的坎坷和不幸，女性都不逃避、退缩，而应自尊、自强，互相扶持、理解和爱，展示出“带着伤疤的特有的美丽”和力量。小说中的三个女性，靠着自己的坚毅和同性的帮衬，相继走出了生活与婚姻的“围城”，走出了自己的人生方向，走出了女性的丰采。对她们作者虽无一褒奖之词，但对母性在日常生活中坚韧平凡却又伟大的赞美已溢于言表，不宣自明。

多元的观察视角，也使作家们时常把笔触伸向比现实世界不知要广袤多少倍的精神领地，测试人性的重量和品质。在这方面，章诒和的《刘氏女》和尤凤伟的《相望江湖》恰好构成了两种不同的向度。《刘氏女》借“我”（张雨荷）之口，讲述了一个由复杂人性引发的女性犯罪的故事，是女囚的悲惨命运和凄清心灵的一次曝光。乡下女子刘月影的相貌和她的名字一样美丽，为了能够过上从小羡慕的城市生活，糊里糊涂地嫁给了城里一个患羊角风的男人老魏。多次找组织交涉希望离婚，问题却始终得不到解决。于是为顾及颜面，不让丈夫再给自己丢脸，她经过精密的筹划，在夜深人静之时，将丈夫杀死、肢解、装坛、腌制起来。东窗事发后她被捕入狱，后因在火灾中舍命救人减刑而被提前释放。当她千里迢迢满怀热望去看儿子栓儿时，对方无法正常接纳她，最后又无奈地带着永远都摆脱不了的受歧视命运回到了监狱，把它当做了自己的“家”。小说以劳改犯人作为观照对象，只是已超越一般性的监狱、劳改文学作品，它从最能够体现人类本性的食、色两方面，将如刀之笔锐利、深准地切入了人性的根部。古人云：“人之初，性本善”，可闪现于作品中的几个女囚的行为却似乎在

颠覆着这一传统信条。为享一点口福，骆安秀用刚在死者身上摸过的手，把死者剩下的几片变色的肉贪婪、急促地塞入口中；一直坚守不拿别人一针一线道德底线的“我”，也被自己发现的死者的十个鸡蛋击败，悄悄把它们占有了。她们把吃作为人生的头等大事，在它面前不讲廉耻。并且在“性”上绝少含蓄羞涩，多的是放荡和欲望。因为长期的精神压抑，她们的思维常离不开性，不时拿同伴的生殖器或穆干事的“家伙”取乐，尤其是易风竹更是口无遮拦，满嘴村话，让人不堪入耳。再体面者进了监狱也个个如鬼，相互揭发批判乃家常便饭，因一点小事就拼命咒骂厮打也司空见惯。这些和刘月影冷静、残酷的杀夫等事件联系在一处，使小说几乎成了一部人性的“审丑图”，展示的皆为人性之“恶”、人性之阴暗与凶残。可是，很多读者看过小说之后，对女囚们却怎么也恨不起来。或者说，尽管作者一再虚化时间和时代背景，不想深挖制度和人的命运关系，人们从作品中仍然可以强烈地意识到，是反人性、不合理的现实境遇和精神摧残，扭曲、异化了女囚们的心灵和人性，所以作品的批判功能仍然十分强烈。试想，如果刘月影找的丈夫可心，如果她能够自由地离婚，恐怕她就不会杀夫；如果犯人们的生活达到了温饱，如果她们正常的心理与生理欲望得到了满足，她们也不会异性面前流露出淫荡、轻佻的目光，失却羞涩的本性。刘月影不还善解人意地为“我”准备暖胃的红茶，不还对老覃、儿子一往情深吗？女囚们再累再苦不也在收工之后排队打水洗涮，维护自己的体面和尊严，不也时常塞给同伴一块窝头片，流露出一丝温情吗？作家超越人物二度平面的性格塑造，还原了女囚们人性丰富和复杂的全貌，令读者对女囚们的“堕落”和“美”的凋零，不知是该厌恶还是该同情，尤其是刘月影和栓儿母子的遭遇揭示的“亲人给罪犯制造的痛苦和犯人给亲人带来的耻辱，丝毫不弱于刑法的惩处”，和那些女囚们掺和着欲求的软弱孤独、绝望恐惧所隐含的人性思考深度，令人战栗，发人深省。监狱可以限制囚犯的身体自由，却无法彻底拯救她们的灵魂，她们的沉沦与罪恶固然和自己有关，但那个民主缺失的时代是不是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到底是谁之罪？小说冷静、客观的叙述，已对社会、现实与历史构成了严肃的拷问。

如果说《刘氏女》演绎了人性的沉沦与阴暗，那么《相望江湖》则表现了人性觉醒、复苏的艰难过程和复杂状态。据作者叙述，《相忘江湖》的雏形源于作者构思中的两篇小说，一篇写印刷厂老板李长吉同乡友解放数年前合伙做了一次案，二人约定彼此“相忘于江湖”，不论何时何地谁也不要出卖对方，另一篇写李长吉与美丽女子单春邂逅，之后保持通信联系，帮助后者戒毒^①。这两篇分别侧重于“相忘于江湖”与“相望于江湖”书写小说腹稿内容，好像两条道上跑的车，互不搭界，作者对它们也都不太满意，先后“搁置”了很长时间。今年年初，作者不知领受了什么神启，思想突然被“照亮”，于是大胆地把两个故事合二为一了。应该说，作者的“并轨”实验是成功的，它借助李长吉及其心理活动这块导体，联通、谐调、整合原本松散、断裂的情节，使两个故事内各自的“死穴”双双被激活，分列的平面、静态的事态，在一个共享叙事空间里获得了立体、流动的意趣，其妙处是谁都意想不到的。李长吉发达了，家庭幸福，财产丰厚，他努力从宋建刚、“丝瓜”王玉成等人提供的线索辗转查找解放，不是因为想念当年一起打拼过的伙伴，要对之施以援手，而是担心解放再作案被抓，在威逼利诱面前“再坚固的攻守同盟也不管用”，把自己供出来。尽管他发达后不断做善事，一直为当初的盲动而后悔，这样猜度他人的“小人之心”似乎也属自然，但其心理的卑劣和龌龊却仍然无可否认、极不光彩。待到结识红颜知己单春后，对方爽直活泼的性格、难得的坦诚信任，特别是殷切地提醒，“今后千万不要再对人讲你有朋友与别人一起作了案”，一定要找到那个工友“把隐患排除掉”，令他更加焦虑的同时，也欣慰于人世间真情和信任的存在。所以他不但在电话中愿意当单春女儿丫丫爸爸的“替身”，给她带来欢乐，而且在单春经济上遇到麻烦被拘捕后，经过希望更换手机号码以断绝与对方联系的短暂犹豫后，便毅然答应为丫丫找回妈妈，乘机前往杭州搭救，使蛰居在灵魂深处的人性、道义终于战胜了商人的利益和卑鄙的私念，心也随之有了舒展的解放感。从“相忘于江湖”到“相

^① 尤凤伟：《〈相望江湖〉创作谈：淡化故事，深入内心》，《中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5期。

望于江湖”，不仅是文本的叙述走向，更凸显了主人公由焦虑、惧怕到觉醒、更生的心理活动轨迹，完成了人性救赎的意向传达。我以为，人不可能一生纯净无比，犯了错误能够改正就善莫大焉。在李长吉的身上，读者看到了未泯良知的复苏，和正常人性的温暖。耐人寻味的是，作者在塑造李长吉这个出没于“官”、“商”两界的形象和解放、单春等“配角”时，不断把他们置于道德和利益冲突的“场”中，测试他们的灵魂，揣摩他们承诺的重量。在如今金钱万能、道德滑坡的令人疼痛的现实中，解放做到了“重诺守信”，单春没有出卖李长吉的秘密，而整日同狡猾的邝副秘书长、贪婪的冰社长、势利的兰作家、奸诈的陈德律师等人周旋的李长吉，也能够在染缸中洁身自好，遵守“江湖”道义。他们的精神支撑和价值坚守，犹如漫漫沙漠上的一小块绿洲，一方面间接对抗、暗讽了“社会”的污浊之气，一方面也张扬了稀缺、珍贵的诚信与义气等传统美德，给人送来了人性的温暖和清凉的慰藉，增强了人们对生活和人类的信心。

杨争光描写土匪题材的《驴队来到奉先时》，在制作惊心动魄的故事同时，也展开了对人性、国民性的复调思考。以九娃、吴思成为队长和军师的十二个土匪，在秋收季节开进奉先时，杀掉不愿让他们留下的村长赵天乐。鞋匠周正良接任村长，先后为他们筹粮、建舍得大院，村民个个敢怒不敢言。“瓦罐”返乡归来，说他们的妻儿跟人走了，又让土匪们开始筹女人。芽子为救未婚夫包子走进舍得大院，包子和被筹女人的村民自发反抗，打死“瓦罐”、土枪手和九娃，抓住另外八个脱得赤条条的土匪。最终包子也离开芽子走了。小说推出的视界令我更加相信，贫困可以滋生许多罪恶，烧杀掠抢，男盗女娼。土匪的驴队是因为蝗虫之灾和饥饿结成，只是农民出身的他们找到的不是摆脱贫困的正路。而面对暴力的驴队土匪，奉先时村民的礼让、妥协、软弱是无济于事的，直到妻女被抢夺凌辱时，村民们才“以恶抗恶”，但救得了性命同时却失去了爱情。不论是驴队的土匪，还是奉先时的村民，都是悲剧的受害者。他们的悲剧有天灾人祸之责，但和自身的弱点也关系甚大。驴队的“革命”目光短浅，只要温饱无虞便万事大吉，财产、女人就是他们的终极目标，并且手段卑劣，不讲道义，结局悲惨自是罪有应得。奉先时的村民受传统牵累过多，加上农民先天的个体、

分散的生活习性，导致他们多逆来顺受，自私自利，近百户人家竟然想不到要集体对付十几个土匪，在利益和危险面前可以置同伴的生死于不顾，甚至以出卖同伴而苟活。土匪要拿他们的妻女泄欲，他们想到的不是反抗、惩罚对方，却不断攀比谁家谁家为什么不在筹人之列等等。就是结尾凭原始、自发的力量镇压住了土匪，也并不说明他们已经觉醒，或者说他们的精神世界依旧是一片没有醒悟的荒原。原来作者对血腥奇异的土匪题材观照，完成的是一个人性与国民性弱点思考、批判的命题。作品虚化、淡化时间背景，不写出故事发生的具体年代，不但没有减弱自身的穿透力，反倒使其主旨获得了更广阔的辐射空间，让所有的中国读者脸红、警醒，看来已有近百年历史的思想启蒙，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

在很多人看来，小说就是生活的艺术。其实这种观念必须击破。古往今来但凡优秀的小说文本，在具体的形象和情感建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沉淀着理性思想的结晶，因为在漫长的时间面前，任何技巧层面的经营都是不堪一击的，能够流传下去的永远只能是人性和思想的深度揭示。当下中篇小说知觉思考力的强化，一方面标志着作家们思维层次获得了实质性的提升，小说观念出现了与时俱进的调整，一方面把文本引向了世界与人类的本质境界，垫高、加实了小说探索的艺术品位。可喜的是作家们的知性化向度，没有单靠智力和哲学去完成，而是走了一条感性、具象化的路径，一条合乎小说规范的路径，形象、情绪、思想三者结合，应该是中篇小说不错的探索方向。

写实的，更是象征的

为适应宽阔生活视野和微妙思想情感的表现，许多作家纷纷尝试在有限的文本时空内收获丰富的蕴含，追求言外的形而上旨归，以扩大自身的容量，增加文本的耐咀嚼力。具体说来，将象征手段引入或贯穿文本，已经成为当下为数不少的作家所钟情的一种方式。本来，象征与意象似乎离诗歌更近，但那些诗性十足的小说家也偶尔涉足，像废名的“桃园”、萧红的“呼兰河”、沈从文笔下的“碾坊”与“渡船”等，特别是鲁迅《孤独者》中那只用来自况孤独但不放弃战斗心态的旷野上受伤哀嚎的“狼”意

象，都属于既是自身又有自身以外许多含义的象征性意象，它们以标题或文本镶嵌的方式多次出现在具体的文本之中，常使文本在底层视像之上有一种形而上的光影浮动，令人去品味、捕捉、琢磨，产生了奇特而简隽的艺术效果。前代作家这种“凤毛麟角”的个性探寻，如今在许多作品中变成了一种普范性的追求。

东西的《救命》即是一篇写实与象征统一的作品。它叙述了一个蹊跷的故事：孙畅在不知情的境况下帮助郑石油和警察劝说、哄骗麦可可，使她放弃了自杀念头，而后男友郑石油突然“失踪”，使麦可可居然“赖”上了孙畅。善良的孙畅、小玲夫妇为挽救麦可可的生命，把跳楼的她送进医院、给她介绍对象匡老师、去精神病院探望她，可无论怎样挖空心思，就是难以给她一桩事实的婚姻，最终小玲无奈地出让了孙畅。这个故事看上去似乎很实在、很具体，人们理解时也不容易出现偏差和歧义。但事实上它仍如多棱镜一样，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接近它，可以得出不同的解来。因为你稍加思考就会清楚，作者写这么一篇小说恐怕不可能仅仅是为了恢复一段生活中的趣闻，以博得人们欢心那样简单。深入追究即会发现，文本整个结构属于饱含创作主体思考的高层建筑，其中许多事态，包括小说题目都不乏象征的内涵。小说中的人物和事态至少给人提供了几种联想方向：麦可可总在追问婚姻和生命的意义，没有爱情就要死要活，认为“生命是可以轻易舍弃的”，这在他人眼里可能是十分傻气的，但它也标明了对人生究竟的一种探询，人活着还是应该有一定的理由和寄托的。中国自五四以来就大谈妇女解放，可是近一个多世纪过去，麦可可居然把生命的意义狭隘地理解为要把自己绑在一个男人身上，获得稳定的婚姻，这是否隐含着对妇女解放运动局限的反思和批判？如果说麦可可因为失恋走向精神偏执，属于个人之疾，尚可理解，而孙畅、小玲夫妇竟然被“责任”逼得发疯，两人被折磨后不断交替地按动电灯开关，灯泡爆了仍赌气似的狂按不止，和麦可可一样失去了生活的安全感，又何尝不是人类深层的精神疾病的折射呢？特别是将郑石油那样不顾责任廉耻却活得逍遥自在，孙畅、小玲夫妇“舍家救人”却麻烦不断这种荒诞战胜常态逻辑、善良与责任一再被利用的黑色幽默式的悖论现象揭示，和当下生活中频繁发生的救

助他者却被诬赖为坏人的事例联系起来，可否理解为是对世风日下、道德滑坡的怪态人性之恶、社会之殇的间接讽刺？作品中三个人物的结局，是麦可可拥有了和孙畅的婚姻但不可能获得爱情，本来生活太平、其乐融融的孙畅、小玲，相爱却失去了婚姻，这种平常得司空见惯的悲剧性设计，在增加读者的压抑情绪的同时，有无生活不完善实乃必然的暗喻呢？上述的一切是文本潜存的意向，它们已不无象征的味道，至于小说标题《救命》的象征、隐喻功能就更强烈。它的字面含义是救麦可可的命，但若就理解到这一层，显然又误读或者说糟蹋了小说。其实，最终陷于悲苦不堪的孙畅、小玲不需要“救命”吗？甚至大而广之，患了严重精神疾病的整个人类不也需要“救命”吗？因此，《救命》可视为替沉沦的人类发出的“sos”信号。

张楚的《七根孔雀羽毛》初看上去同样是由相当琐屑、庸常的事项构成，并且题目和内容之间构不成必然的本质联系。小说写到“边缘人”宗建明虽说是税务局的公职人员，却连自己的家庭都维系不住，随着大老板“郭六”的介入而妻离子散，只好寄居在未婚同居的女友李红家，想向前妻曹书娟讨回儿子的抚养权也几度受挫。他终日无所事事，百无聊赖，工作似乎只是副业，除了在外喝酒打牌、在家吃饭做爱之外，一无是处。最终受朋友康捷的利益诱惑，糊里糊涂地做了杀人帮凶，被关进看守所。透过宗建明的凌乱生活，透过李红的带有自闭倾向的女儿丁丁、沉浸于宇宙幻想最终却策划除掉大款父亲丁盛的李浩宇、从全县包二奶包得最凶最公开的村子走出的郭六、利用女人的身体和心计发达的曹书娟以及貌似平静实则阴毒希图以暗杀谋利的康捷等人物影像，我们发现小说中的人物不辨男女长幼和穷富贵贱，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焦躁、孤寂的精神“病症”，他们之中没有一个完全“健康”的“好人”。事实上，即便在市场化经济不断深入的当下中国日常生活中，正常、光亮的地方、事件、人物仍然是不胜枚举的。可是作家却避开了它们，着力盯住那些阴暗、负面的对象，并有意将其放大，这种写法本身就蛰伏着一种隐喻生命、生活本身无聊、无意义的倾向，它指证社会中普遍存在、流行的“现代病”，目的就是以期引起人们疗救的注意。应该说，这些内涵都是比较浮面的，稍加注意即可从小

说的底层视像里很容易地捕捉到。但是，很显然张楚的写作动机绝对不会是仅仅通过再现宗建明吃喝拉撒的生活流水账，来拍摄和放映平民生活的状态，他肯定另有企图，那么他真正的寓意何在？我想“七根孔雀羽毛”就是打开它内蕴之锁的一把钥匙。按照西方新批评派的理论，“一个语象在同一作品中再三重复（例如艾略特《荒原》中水的语象），或在一个诗人先后的作品中再三重复（例如叶芝笔下的拜占庭），就渐渐积累其象征意义的分量”^①，在《七根孔雀羽毛》这篇一共十三个部分的小说中，先后五次出现的七根孔雀羽毛，就绝非无谓的赘物，而应该是具有表情达意功能的象征性意象了，它的上面肯定附着作者的灵魂隐秘和作品的深层旨趣。孔雀羽毛出现五次，集中起来共提供了以下几个信息：它来路不清，宗建明记不清“是谁送”的还是“花钱买的”；它“色泽斑斓鬼魅妖艳”；它的里面可能潜藏着什么“秘密”；它“不是什么值钱的货”，但宗建明却长时间把它当成“宝贝疙瘩”，“舍不得”送人。综合这些信息，不难破译小说隐藏在七根孔雀羽毛意象背后的真正旨归。和《七根孔雀羽毛》的姊妹篇《地下室》中潮湿阴暗的下沉意象“地下室”相反，“孔雀羽毛”轻灵美丽，是关涉飞翔、向上的意象，它虽然只是放在皮箱里的静物，没什么具体用处，可主人公却一直保存着它，不时地拿出来专注地凝视。我想作者以它命名小说，是意欲表达作为一种具有反物质取向的精神存在，它既象征着对过去美好生活的一种缅怀、追挽，也反证着对当下生存的不满、否定，更寄寓着超越泥实平淡的“地面”生活、融入纯净理想“天空”的渴望和幻想，这恐怕也是整个小说的深层“秘密”所在。如此说来，就难怪终日焦虑、经常失眠的宗建明进看守所后，内心反倒平静舒服了，感到“中午的阳光透过铁栏杆射进来，在肮脏的地板上打着形状不一的亮格子，不计其数的灰尘在光柱里安静地跳舞”，留下了一线希望的启迪。七根孔雀羽毛这个极其诗意化的意象，同凡俗无聊的生活搅拌在一起，也让小说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张力效果。

^① 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第15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最能体现写实与象征结合趋向的典型文本当数方方的《民的1911》。据方方说，这篇作品中“只有‘民’以及与他相关的家人、邻居是我虚构的”，而“其他人物都是起义中的真实人物，他们所经历的都是来自真实的史实”^①。这两类人物分属于并置的象征层和写实层，作者却凭靠“民”看与想的视角，把它们巧妙地联通、绾结在一处，建构起一种虚实相生的一体性叙事模式。对宏观的辛亥革命的现实一维，作品努力进行回归与还原。它在1911年10月9日到12日仅三天的狭窄时空内，简净而又丰满地再现了起义艰难曲折的全过程，其中恢弘宽阔的格局，纷繁生动的人物，紧张庄严的气氛，激烈火爆的冲突和相对完整的事件等组构的自足世界；革命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统一、外在现象与内在规律谐调、人与历史互动等辩证关系和问题的揭示；以及蒋翊武、刘复基、孙武、邓玉麟、熊秉坤、吴兆麟等革命核心人物与协统黎元洪、总督瑞澂等栩栩如生、个性纷呈的形象塑造，均达到了宏大叙事的述史要求。这些有效驾控的拿手好戏，在方方那里根本不是事情，此处也无须多论。可是如果小说若停浮于此，充其量只能算比较优秀的历史小说，也就失去了超出同类小说的资本。可贵的是方方塑造了“我”、“我父亲”等几个贯穿文本的虚构形象，他们看起来个个都血肉丰满，具体可触，但实际上却都是兼具象征功能的特殊“符号”。他们象征着什么？作者坦承“‘民’这个词很有意味，既是武昌城一个剃头匠的儿子‘民’的名字，也象征着民以及民国，象征着王的国从此变成民的国”^②。按字的本意，“民”为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指人或人群，它既指代单独的国民个人，也指代一个民族。作者以双关话语“民”和“1911”组合，自然为小说提供了具有多种阐释可能的空间，你可理解为十三岁的小孩“民”看到、听到、感受到的辛亥革命，也可理解为人民在这一年遭遇的从“王的国”到“民的国”的起义过程 and 变化。象征性的形象“民”的视角运用独具匠心，它以形象化方式表明革命已是大势所趋，连孩子都认识得很清楚，并能同革命的进程一起成长，何况成人？

① 卢欢：《方方：革命胜利让武汉人更自信》，《长江商报》2011年7月8日。

② 卢欢：《方方推出中篇小说〈民的1911〉》，《长江商报》2011年6月24日。

与“民”不同年龄段的赵裁缝、“民”的父亲等人物的设置又能与之巧妙呼应，相互衬托，他们或从最初的关心国事到冒死为革命者制作铁血十八星旗，或从遇事哇哇直哭到最终坦然为黎元洪剪辫子，暗喻革命已让无数的普通百姓觉悟，思想和行为上不断进步。尾声部分的武昌祭天大典上“民”意识到“从此以后，中国不再是帝王的国，而是民的国了”，并在以后一直向后代传达一句话“民，你要努力奋斗”，也寓意深刻，耐人寻味，那是“民”个体的声音，也是很多百姓乃至一个民族共同的企望。与革命者命运已融为一体的“民”的象征形象创造，改变了小说感知世界的方式，使《民的1911》有别于一般性的辛亥革命的冷面历史叙述，而转向了辛亥革命在百姓心中投影和回应的书写，“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在小说认识价值的基础上，更增强了人性的深度色彩和文学的抒情化韵味，使读者感到历史不是飘渺的浮云，而是真切可信的身边存在。作者以虚构创造了“民”的象征，而“民”的象征又扩大了读者的想象，使他们阅读时会自然考虑历史真实以外的许多问题，从而进一步调整、扩大联想、思考的路径，丰富了小说的思想蕴含。

追求写实之上的象征性指向，是许多作品的突出取向和取得成功的保证，它既表现为文本结构、主题与手法各方面的整体性象征，有时又以局部象征的方式镶嵌在文本之中，或意象象征，或命名象征，或人物关系设置的象征等等，不一而足。如《她的城》中那个多次出现的旋来转去的“陀螺”，就是一个象征意象。它是和武汉人的习惯、爱好连在一起的物件，也是诗意和浪漫的象征体，试想，在车水马龙、灯红酒绿、游乐业高度发达的都市，为很少有人光顾的陀螺付出时间和心思，不就是对童心、美好记忆的一种坚守，不就是对单纯、浪漫个性的一种张扬吗？《刘氏女》比较讲究人物命名的象征寓意。它写到的女囚名字大都带着诗意的美，尤其是刘月影和张雨荷的名字，“前者象征着人生的游移不定、变幻莫测，笼罩着一种凄迷而神秘的色彩，体现出作者对她的怜惜和同情的态度；后者则既象征着无辜者遭受风欺雨打的境遇，又象征着身陷泥淖依然不可污染的风

骨和节操，体现出作者对这个人物的一种积极的道德评价”^①。给予监狱的犯人这样美丽的名字本身，就昭示出作者对人类本性的坚信和对美好未来的执著。这种借鉴于诗歌的写实与象征结合指向，在小说的精神层面与技巧方法中的大面积生长，常常能够统一人间烟火与形而上学，敦促叙事性文本在走向具象同时又超越具象，描述实体同时又联系着实体外的世界，使小说渐渐由平面结构趋于立体建筑，获得了多义性、多重性的审美旨归和阐释空间，虚实相生，朦胧而有余味。当然，有时文本的象征企图过于隐蔽，也让一些读者体会不到，无法彻底地领悟。

文体压力：转移与释放

说新时期以来的中篇小说成就斐然，并非就意味着中篇小说彻底消除了文体压力。事实上，我们必须正视：中篇小说文体本身欠稳定，从二三万到十一二万字数不等；既少长篇小说的理想容量，也无短篇小说反映的迅捷，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上挤下压”，使得它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并不发达，因“先天不足”建国前就没得到充分发展，除了《阿Q正传》、《边城》、《月牙儿》等名篇外，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很少，建国后由于受史诗化情结和紧跟形势的心理驱动，在夹缝中生长的它也是园地寂寥，口碑不佳，《我们夫妇之间》、《洼地上的战役》等屈指可数的几篇，根本未改变它量少、质低的整体格局，甚至人们评判短篇小说不够精练时，常常挂在嘴边上的的一句话就是“有中篇化倾向”。也正因为认识到了中篇小说的不利因素，所以那些志向高远的小说家从来就没在新时期之初中篇小说的黄金期沾沾自喜过，即便是在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关注现时、现事（也包括历史现实），力争以不同的观照视角、话语方式、叙述风格贴近书写对象的当下，他们也一直在探索着转移和释放中篇小说文体压力的可能性。他们清楚，中篇小说在对日常经验的占有和复杂问题的处理方面得天独厚，但论细敏微妙感觉的表现、内在灵魂的抒放和想象力的神奇，恐怕要远远逊色

^① 李建军：《穿越人性黑暗的文学远征——读章诒和小说〈刘氏女〉》，《小说评论》2011年第4期。